

更加精致，题材更为广泛，风格更趋多元。

据考证，“仿古”铜器自宋代兴起，并在元、明、清各朝持续流行，其背后的内在驱动因素值得深思。以“考古”“恢复三代”为初衷的仿古铜器，随着时代风尚的变迁，发生了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功能性质变，内中蕴涵的社会意识值得关注。这些铜器从三代的固有符号中蜕变衍生出全新的品类与功能，成为反映时代艺术风尚的重要指标。可以说，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铜器，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特审美标准，对其他装饰艺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因此，本次展览重点关注这一时期的中国铜器珍品，研究它们对于早期青铜礼器传统的解读、传承与发展，同时结合同时期的漆器、陶瓷、玉器等，展现文人陈设清供中的怀古风尚与文化自觉，呈现中国晚期铜器这一门类文物的独特艺术价值。

此次展览，通过“重建古礼”“法古悦新”“垂范创新”“起居有铜”“怀古味永”五大板块，按照时间顺序，以独特视角揭示中国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精神世界，带领观众领略中国宋元明清时期青铜艺术的独特魅力，共同探索这一时期青铜器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不断寻求突破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其中，来自中国的近 60 件

借展作品尤为引人注目，包括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宋代皇家卤簿巨钟，上海博物馆的有史可考的历代文庙礼器，以及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清宫造办处御制仿古铜器等，弥足珍贵。

作为礼制乐器，编钟是“和”从自然现象到人文观念的载体。此次赴美展出的大晟钟，原为宋徽宗时期“大晟”新乐中的编钟，是中国古代乐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，也是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国宝级文物。此钟属椭圆筒式乐钟。钮作相对的扁体双夔龙龙首饰粟纹，龙身饰回纹，二龙之间有一方形小环钮。钲部周廓及篆带饰多层蟠虺纹，乳枚作螺旋式半球体，隧部以蟠虺纹组成翼形图案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大晟是北宋王朝的宫廷乐府名。大晟府的大司乐为长官、典乐为副，下设大

乐、鼓吹、宴乐、法物、知杂、掌法等六个部门，各部官员由京朝官及通晓乐律的士人充任，专门在重大庆典活动中典礼司乐。大晟编钟就是大晟乐府的乐器之一。当时，作为统治者，擅丹青、通音律、好美物的宋徽宗有感于宫廷乐器音律不齐的现状，于是命人根据出土文物编制了《宣和博古图》，并据此铸造了 12 个为一套的“大晟钟”，分两层悬挂在一座装饰着蹲兽、羽毛的华丽钟架上，不仅极为华丽，且其形制、纹饰是仿制当时出土的春秋晚期宋公戌钟，每套钟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，发送中国各个州府，作为标准音律定音，统一了音高。宋徽宗深信，规范化的铜礼器能够引导社会风气，带来盛世繁荣与安定和平。如同其所命编纂的《政和五礼新仪》中所言，他意欲恢复上古时期的礼仪并融入当时的审美气韵，焕发铜器其新生。因此，历经千年的沉寂，铜器的制作得以重启，开启了中国铜器的全新纪元，并延续了八百余载。除却皇家祭祀所用的铜器，几乎每座城市的孔庙（文庙）也纷纷开始铸造大量铜器，蔚然成风。

这件编钟不仅是宋代“仿古”铜器的代表作之一，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在靖康二年，全套大晟钟被金人掠走，送往上京，后来进入佛教寺院，作为佛教乐器

右图：大晟钟，原为宋徽宗时期“大晟”新乐中的编钟。

